



“国学管理”值得期待吗？

(2006-5-14 7:22:33)

作者：岳占仁

转载于：博锐管理在线 www.boraid.com

张瑞敏认为，中国没有一流企业是缺乏优秀制度的结果，学习和应用西方管理体系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头正颈松，舌抵上颚，两眼微闭……”佛香缭绕中，几十名学员端坐蒲团，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教授的引导下一起进入周易中所讲的无思无为的境界，领悟卦爻符号的奥秘。

张其成的易和书院国学会所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东侧一座公寓楼的顶层，会所装饰得古色古香，张教授和几个学习辅导员全部唐装布履，缕缕天光透过头顶的天窗洒进来，墙上几处挂着隶书体的“禁语”两字，不时提示“易道精华”班的学员：参悟的要义是一个“静”字。“管理就是管人，管人在于心智的教化，大易强调的无思无为的洗心之法，恰好是人类修行心智的核心方法。”张其成看来，中西商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使得西方管理体系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企业（准确地说是所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管理的出路在于向本土的传统国学智慧求助，开创适合自身内外环境的国学管理体系。易道作为统领国学智慧的主干，包含了宇宙、社会、人生运动变化的大规律，以及测变、知变、应变的大法则，应当承担起国学管理智慧源泉的角色，再以易道主干串起儒、道、释、兵、医等国学管理智慧支脉，共同组成国学管理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的外围，是国学智慧之“道”统驭下的西方管理之“术”，道之驭术就像大脑支配四肢，二者在体系中相得益彰。

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着实让人大开眼界，然而仔细琢磨一下其立论的基础，又非常让人困惑。西方管理体系在中国水土不服，这个判断有些似是而非。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的都是从本国复制过来的管理体系，照样运行得很好，并没有因为中国“特殊的环境”而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国本土企业中的佼佼者也无一不是持之以恒地认真学习和实践西方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西方管理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组织运营和商业智慧的结晶，虽然贴着“西方”的标签，但对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营的组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现代”管理体系，即使在中国非常年轻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威力。这个道理张瑞敏表达得很清楚：中国没有一流企业是缺乏优秀制度的结果，学习和落实西方管理体系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长期任务。

退一步讲，中国现在的商业环境是距离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一些，还是距离易道产生的三皇五帝时的状况近一些呢？中西文化差别的确存在，但更多是一种纵向的动态的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拿制度环境来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制度变革过程，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制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是同质多于异质。

至于人文环境，即“人心”上的差别，譬如说中国人更重视人情，更讲变通。因此张其成断定，“中国企业实际上需要的是治理，水字旁的‘治’，讲的是柔性、变通；西方的管理，是竹字头的‘管’，对中国人来讲显得过于硬性、严格。”“在中国推行西方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势必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

这里且不说在人类心理活动这一所有学理之逻辑基础上存在共通的天性，即钱钟书先生指出的：“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单从社会人文环境表层来看，“人心”也是在变化的。我曾经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在十几年前开“面的”时，“宰”乘客是家常便饭，那时多数司机也都跟他情况差不多，现在开轿车了，“乘客精明多了，自己也长进了，不去干那些没意思的事了。”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制的实践、教育的滋润、媒体营造的氛围等正在合力推动着中国“人的现代化”，培育着现代商业人文精神：契约精神、对制度的尊重、对个体的尊重、合作精神、信任精神等。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西商业环境将会有更大的共通性，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横向地、静止地谈中西差别，运用道家“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智慧一味地强调顺应目前一个时点上的环境容易产生误导的结论，实际上也就站在了阻碍现代商业人文精神养成的阵营里去了。

张其成把国学管理体系概括为“123580”：太极、两仪、三才、五行、八卦、无极。“其中对应着企业从成功到成熟的发展规律，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智慧。”——这种从古圣先贤那里一脉相承的演绎法门让你油然而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感觉，不是一时片刻能够参悟得透的。张其成举例说，伊利公司的郑俊怀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心智功夫的欠缺，导致一念之差违反了“履卦”的义理（履者，礼也，意谓合乎制度规范的实践），最后酿成苦果。这两年国企领导黯然落马的事件不少，是不是研习国学心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号称《易经》手不释卷的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为在期货市场违规操作酿成大祸，反思这个事件的教训，究竟是陈久霖尚未得易学三昧，还是中航油当时缺乏现代企业要求的严格监督制约机制呢？

国学管理仅仅是国学热的一个支流。国学热这两年好像在持续升温，某高校甚至还让国学搭上时尚快车，通过手机短信提供随时随地的国学教育服务。国学热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对发达国家“薯片”、“芯片”、“大片”联合进攻下长期“文化入超”状况的忧虑，有经济持续增长滋生膨胀起来的“盛世情怀”，有国际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围绕着国学复兴话题涌现了许多赞成或批驳的言论，让人想起20世纪初期那场中西文化论战，只不过此时的“中派”阵营里没有了留着辫子给学生讲课的辜鸿铭那样的极端代表人物，我们顶多偶尔能够听到冯其庸老人“要用国学智慧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言论。

用国学智慧治理国家也罢，管理企业也罢，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发展的眼光，要用现代知识系统给国学一个适当的关照和解释，警惕“人类文明，一旦成熟就容易走上嗜癖钻角的死路，也容易因炫示智能而蹈空凌虚，陷入另一条死路”（余秋雨语）。然后再搞清楚国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在哪里，结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否则，受到伤害的不止是国家和企业，还有我们弥足珍贵的国学本身。

[\[关闭窗口\]](#)